

近现代浙江名家教育思想 与当代中国教育

杨荷泉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近现代浙江名家教育思想 与当代中国教育

杨荷泉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现代浙江名家教育思想与当代中国教育 / 杨荷泉
著.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81140-772-3

I. ①近… II. ①杨… III. ①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浙江省—近现代 IV. ①G40—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4347 号

近现代浙江名家教育思想与当代中国教育

杨荷泉 著

责任编辑 郑建 梁春晓
封面设计 王妤驰
版式设计 梁春晓
责任印制 汪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50 千
版印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40-772-3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目 录

导 言

由传统而现代:浙江古代教育与近现代名家	/ 001
---------------------	-------

第一章 以文艺运动促教育改良的一代大师	/ 007
---------------------	-------

章太炎:国粹教育的国学大师	/ 009
---------------	-------

王国维:“体智德美”四育造“完人”	/ 022
-------------------	-------

鲁 迅:立人教育的文化启蒙者	/ 036
----------------	-------

朱自清:知识与人文并重的教育家	/ 048
-----------------	-------

第二章 多阶段教育全面发展的实践者	/ 059
-------------------	-------

蔡元培:“五育并举”与“兼容并包”	/ 061
-------------------	-------

竺可桢:民主办大学唯“求是”精神	/ 071
------------------	-------

经亨颐:“与时俱进”开创中等教育	/ 078
------------------	-------

陈鹤琴:幼稚“活教育”发现小孩	/ 088
-----------------	-------

第三章 走进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家	/ 097
蒋梦麟: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 099
马寅初: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实践者	/ 109
马叙伦:从晚清到共和国的教育家	/ 116
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知行合一者	/ 132
夏丏尊:人格和爱的教育改革者	/ 140
第四章 当代中国教育文化的现实与重构	/ 151
尊重儿童:丰子恺和周作人儿童教育观与两种文化的重构	/ 153
叛逆少年:当代青少年犯罪与不当家庭教育	/ 166
粉红青春:大学生同性恋现象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 176
回归本真: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文关怀	/ 184
结 语	
从两浙到海内外:近现代浙江名家教育思想的深远影响	/ 190
参考文献	/ 195

导 言

由传统而现代：浙江古代教育与近现代名家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理位置优越，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七山二水一分地的两浙大地与黄河、长江流域一样，也是我国古老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文化发达。根据考古发现，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7000 年，杭嘉湖平原的马家浜文化距今约 6000 年，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距今约 5000 年。三种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吴越文化的主流，后来又与存在于浙江中西部地区及浙南瓯江流域的两个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建立起可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史前文明。

浙江省人文荟萃，探究其主要原因，应该归功于浙人历来重教育，把教育视为第一要务。春秋后期，越王勾践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国策以富国强兵，终于灭吴而雪耻，成为一方霸主。勾践所谓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实际如晋代杜预为《左传》所注是“生民聚财富而后教之”，简言之则是增殖人口，聚集财富，而后对人民进行教育，以提高全民素质。这是浙江教育有文字记载之始。

浙江是传统教育基础十分深厚的地区。早在东汉初年，上虞私

人所办的蒙学机构已颇具规模。汉代会稽(今浙江绍兴)就诞生了一位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大教育家王充,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即使时至今日,仍能给我们以启发。此后魏晋、隋唐时期,浙江教育续有发展,在全国有较大影响。

两晋时期,平阳、永嘉两地建有官学,世家大族中开设家学蔚然成风;隋唐至两宋,各地官学普遍设立,书院讲学之风极盛,奠定了学术繁荣、教育发达的局面;宋代是浙江教育的兴盛时期,其表现为官办的府、州、县学更加完善。北宋时,范仲淹、王安石等曾担任浙江地方官员,所至即十分关心学校建设,范仲淹还亲自讲学,王安石为学校聘请名师前来讲学。熙宁间(1068—1077)陈襄任杭州知州,办学不遗余力,并撰《劝学文》鼓励士子读书求学。苏轼于此时任杭州通判,在办学问题上与陈襄意见一致,他不仅亲自参加熙宁八年(1075)贡举考试的监考,同时作《催试官考较戏作》诗,催促阅卷的官员认真阅卷,不要辜负学子的期望。为了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他在第二次到杭州任知州时,于元祐四年(1089)向朝廷上奏《乞赐州学书板状》以解决学校经费的不足的问题。北宋时,浙江教育影响最大的是胡瑗在湖州州学所创立“湖州教法”,不仅推动浙江教育发展,而且对全国有较大的影响,成为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太学的法则。

南宋建都杭州后,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时国立的太学、武学均在杭州,同时府、州、县学也得到发展,可以说南宋是历史上浙江教育最兴盛的时期。宋代在官学得到重视和发展的同时,浙江的私人讲学也得到充分的发展,由此而带动了书院的建设,出现历史上一批有全国影响的书院。浙江的书院教学和讲学活动,北宋已开其端,如宁波的“庆历五先生”和温州的“元丰九先生”的讲学活动是书院讲学的代表。及至南宋,书院讲学更盛,主要是当时大儒朱

熹以及吕祖谦、张栻等著名思想家在金华等地讲学,由此浙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如宁波的甬东书院,绍兴的稽山书院,上虞的月林书院,台州临海的上蔡书院,金华的丽泽书院,东阳的石洞书院,衢州的柯山书院、清献书院,桐庐的钓台书院,淳安的石峡书院等。由于书院的兴盛,学者讲学影响巨大,所以南宋时的金华、温州、宁波遂有“小邹鲁”之称,同时出现并形成了以地域命名的各种学派,如金华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永康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温州以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宁波以舒璘、沈焕、杨简、袁燮为代表的四明学派等。其中如吕祖谦、陈亮和叶适等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元、明、清三代,浙江教育依然兴盛,文风经久不衰。元代蒙古贵族统治者习于征战,而不重视教育。及至元世祖统一天下称帝后,在西夏人高智耀的建议下始重视教育,就官学而言,各路设有学校,县有县学。就浙江教育而言,不若宋代影响之大,但续有发展。元代浙江书院亦得到发展,据《续文献通考》及《宋元学案》等粗略统计:浙江书院在全国所占比例较高,例如,湖州的安定书院、东湖书院,慈溪的慈湖书院,宁波的躯山书院,处州(今丽水)的美化书院和台州的上蔡书院等均为当时著名书院。元代浙江基础教育比较发达,在城镇乡村中私塾和家塾比较普遍。例如,金华学者许谦,少时即由其母陶氏口授《孝经》《论语》,进行基础知识教学。后从师学习,最后成为一代名学者。

明代浙江教育较元代有所发展。就官学而论,由于明太祖朱元璋明令“教化以学校为本”,命州县皆立学校,延请学者,教学生员,并明确规定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负责地方教育事宜,又规定府学需设训导四员、州学三员、县学二员,具体负责教学业务,并且对课程设置也有明确规定。明代浙江书院数量较前代有所发

展,并且书院质量较高,影响亦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浙江还涌现出了王守仁(阳明)、刘宗周(念台)这样的教育家,对浙江教育事业的推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王阳明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位大家。

清代教育制度比较完备,学校设立和考试制度基本继承自明代。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政府下诏废止科举考试,新式教育随之兴起。清代浙江教育以杭州为最盛,就书院而论,杭州的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饮誉浙江,而诂经精舍更是闻名全国。清末杭州求是书院的创办,标志着浙江新式高等学校的诞生。

鸦片战争以后,浙江又是我国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区域之一。随着宁波、温州等地的先后开放,外来势力大举进入的同时也引入了新观念,注入了新的生机。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下,浙江不乏学贯中西、走在时代前列的教育家。他们受前人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摒弃了盲目自大的传统心理,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吸收现代西方文明,以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他们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的过程中,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盛和西方教育的进步,开始把目光从古圣贤的经典移向域外世界,从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中探寻改革中国教育的良方,并将之付诸实施。

民国时期,浙江的高等学校几乎集中于杭州,如浙江大学、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之江大学等。尤其是浙江大学,在国际上亦享有很大声誉,当时即有“东方剑桥”的美称。英士大学创办于抗战期间,原称浙江战时大学,后为纪念陈英士而改名。该校初设三院,分别在丽水、松阳两地授课,抗战胜利后迁至金华,建国后停办。

作为文化之邦,浙江自古以来就涌现出王充、吕祖谦、陈亮、叶适、程端礼、金履祥、许谦、王守仁、刘宗周、黄宗羲、朱之瑜、陈确等

一大批杰出的教育家,他们大多不囿于儒家经学的束缚,提倡经世实学,倡导学以致用学风,尤其在批判传统教育弊端的过程中表现出敢于批判、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后人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近现代以来,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下,浙江得风气之先,又涌现出一大批学贯中西、走在时代前列并享誉全国的教育家,如蔡元培、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杜亚泉、经亨颐、鲁迅、竺可桢、蒋梦麟、张雪门、张宗麟、陈鹤琴、杨贤江等。他们走出浙江,积极投身于全国教育实践,深入探讨近代中国的教育问题,努力推进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现代化。

在浙江近现代诸多的教育家中,有的立足浙江,在教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起到引领潮流的作用,如维新运动时期致力于批判旧学、倡导新学宣传活动的汤震、陈虬、宋恕,兴学运动中最早创办新式学堂的孙诒让,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从事中等教育改革的经亨颐,为浙江大学的崛起作出卓越贡献的竺可桢等;有的走出浙江,在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清末导入西方教育学理论的王国维,主持民国初年教育改革、中国新教育体系的缔造者蔡元培,献身于近代教育出版事业的张元济、杜亚泉,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杨贤江,开创近代幼儿教育的陈鹤琴、张雪门和张宗麟等;有的则专注于某一学科的教育,成为学科教育方面的杰出代表,如曾任京师同文馆数学总教习的李善兰,在音乐、美术教育方面造诣很深的李叔同,毕生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马寅初,在近现代国文教学改革方面颇有影响的夏丏尊、陈望道等,他们在浙江和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书所涉及的近现代浙江名家并不仅限于教育界人物,而是关注这些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产生过全国性影响的浙江籍代表性文化名家。鉴于浙江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目前已经有较多论述,而个案研

究则较为分散,所以本书希冀通过对一系列个案进行集中整理,以点带面,对浙江近现代文化各领域代表性的名家教育思想进行深入梳理和研究,力图还原或再现近现代浙江教育的风貌。因此,本书遴选人物的原则是:空间上,其原籍是浙江;时间上,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此为坐标系,确定蒋梦麟、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蔡元培、竺可桢、经亨颐、陈鹤琴、章太炎、王国维、鲁迅、朱自清、丰子恺、周作人等浙籍大家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这些名家对近现代中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他们要么是以文艺促教育革新的文化大师,要么是全面发展观与多阶段教育并行的实践者,要么是弃旧迎新走进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家。他们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就是对于当代中国教育也有深远的影响,追溯和学习探讨研究他们的教育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教育文化的现实与重构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文化是一条源自祖先流向未来的河流,它需要一代代人的继承和发扬。浙江历来人才辈出,就在于两浙大地自古就有浓厚的文化传统和家学渊源。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两浙区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教育家,培养了浙江一代代文化精英,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又以文艺运动的方式积极反哺故土和社会,为近现代浙江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在西方,教育的发展与演变和文艺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成为了教育改革家们的思想利器,这一运动促进了近现代西方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同样掀起了一场教育改良和革命。国学大师章太炎一方面尊重传统文化,大力倡导“国粹教育”;另一方面也提出要立足本国文化,积极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他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宣扬新的智育观和德育观。美学大师王国维积极推崇身心两方面的“全人”教育和终身教育,重视培养有教师技能的专职教师。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更是以其深邃的思想光芒,照耀出国人黑暗漫长的历史顽疾。他强烈反对奴化教育,将改造国民性的“立人”教育思想,始终贯彻在他的文化启蒙和文学实践中。做过中学和大学教师的朱自清,在实践中提出“以学生为本位”的师生观,注重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情爱教育和生存教育,是现代语文教师的楷模。他的知识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的思想,与当代中国的素质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章太炎：国粹教育的国学大师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浙江余杭人士，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著述甚丰。

章太炎出身书香门第，1897年因参加维新运动被清王朝通缉，流亡日本。1903年因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和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被清廷逮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前往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9年编有《教育今语杂志》，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恨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作为那个乱世中的仁人志士，章太炎始终以身作则，走在时代



的最前端。教育并不是他研究的唯一范围,他涉猎甚广,其中包括经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虽然章太炎先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家,但是他提出的许多教育理念很有影响。在当时那个遍地战火的时代,仁人志士在面临国家灭亡的命运前,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章太炎也不例外,但他并不只是单纯地选择某一条道路进行他的救亡使命,他投身革命道路,希望借革命拯救国家,他也曾投身文化事业,希望通过拯救人们的心灵来使中国焕发新生。同时,他也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先后倡导“国粹教育”等教育理念,并阐发了自己的“智育观”“德育观”等。他的教育思想先进而丰富,其中最为鲜明的是贯穿于其教育思想始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是由当时的时代和章太炎本人性格等方面所决定的。在近40年的研究中,章太炎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时至今日,依旧对当代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章太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培养出许多知名学者的一代宗师,章太炎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令他学识深厚,国学功底十分扎实,他在音韵文字学、史学、经学、诸子学、文学、佛学等方面均有建树,而他的许多教育思想便是源于源远流长的国学之中。这跟他作为时代先驱的身份并不矛盾,尽管他不满清廷,参加革命以救国,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仍然与古代教育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章太炎的教育思想并不是一味地继承了前人成果,他是基于中西相交的基点,以统筹的眼光来看待不断发展着的教育事业,对于中西的教育理念均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加入了自身长期研究的成果,由此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章太炎教育思想,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发展史当中不可忽视的里程碑。

在章太炎先生的教育思想当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他的“国粹教育论”。顾名思义，这在当代中国也是十分重要的教育思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丰厚的文化及其传统，如何将其中精粹的文化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是一个相当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前，追根究本，首先应该认识到国粹文化的重要性。章太炎先生的“国粹教育论”就给予后世相当重要的启发和深思。

20 世纪初期，清廷为了巩固其统治，开展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也由此拉开了序幕。洋务学堂大量引进西学，与此同时，留学风潮也开始兴起。这在章太炎看来，是“时间一变，风气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①。但是，这并没有从实质和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社会本质，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成为了彻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论是类似于洋务运动这样的由上层建筑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还是类似百日维新这样的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起的改良运动，都无法拯救国家的命运。

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人衡量事物的标准，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传统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及教育方法的看法，以致在教育思想领域出现一种民族悲观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②

此时，有些像蔡元培这样的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关乎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只有从教育出发，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如果一个国家由一群毫无文化的人接手的话，这个国家的未来是可想而知的。与此同时，一向主张推翻清政府的章太炎先生，也发现了教育的重要地位。针对前文所说的状况，他认

①② 刘虹、刘在山：《试论章太炎的教育思想》，《河北学刊》1996 年第 2 期。

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①。

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提倡普及平民教育，后他所撰写的多篇文章被整理并出版为《章太炎的白话文》，其中具体阐述了他的国民、国粹教育思想。在苏州开办国学讲习会期间，他又出版了会刊《制言》，为半月刊，用以弥补和扩充讲学内容。

由此可见，章太炎先生并不是一心闭门造车，只会提出泛泛而谈的口号的学者，而是一位真正亲身实践、以身作则的大学者。他的教育思想，并不只是说说而已，相反，他能够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将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再将他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来。同蔡元培等人所不同的是，章太炎并未将教育事业作为他研究的唯一领域，他博闻强记，钻研范围涉及多个领域。这对其教育思想的形成，是有益无害的。这能够令章太炎站在一个相对公允的角度，博览全局，纵观古今，由此形成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因此，章太炎先生的教育理念的产生，应该综合三方面的情况来看：其一是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其二是当时的历史原因，其三则是他的教育实践，在这三大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其教育思想。

章太炎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主要如下所述。

一、国粹教育论

章太炎先生的“国粹教育论”是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提出的，当时受西方思潮大量涌进的影响，教育领域一时之间出现了一种民族悲观主义，否定自己的文化，否认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甚至认为中国本身没有学说，现代的学者也是不值一提的，一味迷信欧美学说。在这种情况下，章太炎提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即

^①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话文》，泰东图书局1921年版。